

的排序将发生变化,“金砖四国”将入围,加拿大与西班牙将出局。虽然金融格局调整相对滞后,伦敦金融中心在大英帝国衰败 60 余年后作用依然,纽约也仍将占据重要位置,但亚洲的影响力在上升,北美、西欧、亚洲金融三足鼎立格局初露端倪。美国深陷危机不能自拔,中国不在风暴中心,影响可控又具有足够的财力,这种独特优势将使中国在本轮调整中获得跃升契机。2009年,中国经济增速将降至

7% - 8%,但总量将增至 4 8万亿美元上下,可能与日本经济规模并驾齐驱,危机将使中国经济提前五年跃居世界第二。

大危机潜藏大风险,孕育大机遇,预示大变革。“乱、变、新”将是未来世界经济的主要特点,全球将“乱”于金融调整,“变”于国际秩序,“新”于力量格局。避险需要大智慧,发展必须抓机遇。○

金融资本扩张逻辑的极限

唐永胜 (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副所长 教授)

世界正在经历的金融风暴及由此带来的经济衰退,可被视为当代国际体系演变进程中的重大事变。表面上看,金融危机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自由资本主义模式遭遇的一次重大挫折,表现为金融系统崩溃,管理体制没能约束普遍的金融违规和腐败行为。然而在深层次上,危机的成因触及根本且影响将十分深远。尽管危机远不及 20 世纪 30 年代全球经济大萧条造成的剧烈动荡,却至少可以和“9·11”恐怖袭击相比拟。之所以得出这一判断,是由于这次危机冲击了当前国际体系赖以维系的重要基础,金融资本扩张遇到了严重困难,金融资本扩张的逻辑已经发展到了极限,国际体系必将随之发生改变。

30 多年来,国际关系发生的最重要变化之一就是金融资本代替产业资本成为资本全球性扩张的主导力量,金融资本成为维持国际体系基本稳定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其扩张逻辑成为决定国际体系性质的最主要构成因素。金融资本的扩张超出一般想象,危机爆发前在西方国家其占全部商业利润的比例已经达到 50% 左右。马克思曾预见,有一天底特律汽车公司的利润将主要不再来自生产汽车,而是来自信贷部门,100 多年后这种预见得到了证实。现实中,正是以金融资本扩张为基础,美国的全球霸权才得以维护,乃至发展成一种金融霸权。金融资本扩张逻辑是认识国际经济关系的核心范畴,甚至也是理解国际政治的一个重要视角,政治角逐的背

后在很大程度上是资本积聚的能力。一些关于世界经济的分析以及国际关系的研究,通常被具体的事件和所谓的实力变化所牵引,而缺少对其演变依据和逻辑的揭示,因而也就使得有关分析和研究缺少足够的生命力,甚至在一些问题和领域形成了经济学教条和政治学教条。

事物发展都有极限,金融资本和金融霸权也不例外,而一旦达到某种极限,就会对经济发展带来极大的消极作用。即使在美、英等西方发达国家内部,情况也与 20 多年前大不相同了。金融危机首先从美国爆发并迅速波及开来,长期以来持续增长的世界经济遭遇重大挫折,美英经济模式受到挑战,其中就包括曾无限风光的美国汽车产业。20 世纪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为摆脱石油危机的影响和经济滞胀的困境,时任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和美国总统里根大力推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崇尚自由竞争。这一政策极大刺激了西方经济和世界经济的增长和金融资本的扩张,但也带来贫富差距的扩大,财富几乎不受节制地向大金融资本积聚。而当金融资本严重脱离刺激生产活动的职能而疯狂逐利,并把贪婪的手伸向普通民众而发明出所谓的次级贷款时,风险就陡然升高了。金融危机实际是经济断裂、社会断裂的必然反映,加上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消费与储蓄关系严重失衡,危机也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金融资本一方面推进全球化的迅速发展,另一

方面也以全球化为自身扩张的条件。在美国经济自身遭受危机前的较长时期里,金融资本扩张的负面效应大多作用于不发达地区。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发展中地区反复发生金融动荡,其根源不仅仅源于相关国家自身经济缺陷,也与国际金融资本积累扩张的背景紧密相关。拉美、非洲、亚洲和东欧转型国家都不曾幸免,几场金融危机已在深层次动摇了一些国家的经济基础,结构失衡使经济发展困难重重,社会发生动荡,即使是经济增长往往也只能惠及少数与国际金融资本联系密切的行业和领域,最终收获的只能是“不发达的发展”或“不能带来好运的经济增长”,经济发展陷入某种恶性循环。

几年前,《纽约时报》国际事务专栏作家弗里德曼出版了他关于全球化的专著《世界是平的》,曾引起广泛而巨大反响。弗里德曼认为全球化是不可逆转的趋势和不可阻挡的力量,国家体系在其推动下已进入到新的发展阶段。所谓世界是平的,实际是指一种紧密相连的状态,强调在今天这个因科学技术快速发展而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世界中,商品、资本、劳动和思想等等都可以被整个世界共享,一切都可能通过最高效率和最低成本的方式实现。

全球化无疑代表着人类历史进步的大趋势,然而如果忽视全球化进程中可能遇到的困难乃至重大挫折,则难免被历史发展所嘲弄。凡事都有自身演变的过程和约束条件,全球化也不可能直线式发展,更不可能一蹴而就。现行国际体系仍然受资源、市场和发展机会有限的困扰,以金融资本扩张为主要特征的全球化并不能自动带来全面增长,经济自由主义带来的后果之一就是全球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加剧,以及伴随而来的不受公众权力约束的金融资本的畸形扩张。到今天,发达国家经济也陷入极度困难,经济结构出现明显断裂,并可能引发世界经济大幅波动,进而导致社会和政治的相应变化。早在冷战结束时,布热津斯基写了《大失控:21世纪前夜的动乱》一书,书中提及对美国全球领袖地位的威胁,无论现在和将来,都不再像冷战时期那样来自外部,它就潜伏在美国社会本身,体现在伴随着新自由主义而来的经济社会发展“丰饶无度”的危险景象上,而富人贪婪不受制约则是其中重要原因之一。

目前,金融危机已演变为全球经济危机,如主要国家实体经济受金融动荡的严重拖累,且不能在短时间出现转机,就可能反过来又一次累及金融市场,并引发更剧烈的金融动荡。如此全球化进程就会严重受阻,甚至国际安全局势也可能进一步恶化。实际上在一些地区,恐怖势力和极端主义已经在蔓延,反映出国际关系背后掩藏着深刻矛盾以及全球化进程中一些地区、一些人群的极度失败和无望,这也可被视为对资本扩张逻辑的一种非理性反动。在人口众多的南亚,一个时期以来安全局势出现恶化的明显迹象。墨西哥、土耳其、韩国、菲律宾、泰国等对美国经济和安全利益至关重要的国家,都面临信贷收紧、失业增加、社会矛盾深化的问题。在曾将希望寄托于西方并向美欧大量举债的东欧一些国家,外资抽逃严重,经济发展遇到了严重困难,成为外来“飞燕式资本”的牺牲品,社会稳定压力增加,东西欧裂痕扩大。原有的热点问题没有解决,一些潜在的热点也隐约出现,乌克兰、巴基斯坦、外高加索等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局势需要引起更多关注。国际关系正处于重要的转折时期,如果考虑到偶然性因素,我们对国际局势的发展就更不能盲目乐观。

原本平坦的世界也会出现断裂。因此世界各国必须勇于担当共同的责任,强化协调配合,推动世界经济转入健康轨道。不得不承认,要为今天“难以预测和动荡不安的世界上每一件事情做好准备并非人力所能”,这就迫使国际社会尤其是主要国家不得不谨慎从事,进行更多的协调,否则就不能推动国际关系相对平稳的发展,也不利于形成有效的全球治理。未来一段时间的工作重点似应放在刺激全球需求、政府承担起必要的金融和经济责任、强化经济合作协调以避免保护主义的干扰等方面。

危机对中国有明显的消极影响,但鉴于自身相对独立的经济金融体系,中国所面临的风险当在可控范围内。在对外关系中,中国一方面应强化国际合作,乘势拓展国际影响;另一方面也切忌盲目托大,急进抢行。在目前国际危机和体系转型过程中,中国最重要的是解决好与世界的关系问题,进入国际体系的主导性力量之列,更好地保障国家的生存和发展,并为世界的进步多做贡献。○